

静宁文史大观

第二卷 文哉陇干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静宁文史大观

JINGNING WENSHI DAGUAN

第二卷 文哉陇干



目 录

Contents

星 汉 灿 烂

- ◎ 静宁文化概说003
- ◎ 独擅诗苑第一枝017
- ◎ 静宁诗苑方家漫议 023
- ◎ “静宁八景”和“八景诗”045
- ◎ 闲话进士(上)057
- ◎ 闲话进士(下)067

佚 珍 摭 拾

佚 文

- ◎ 王瓚:槐风赋097
- ◎ 王琪:忧旱赋099
- ◎ 慕天颜:自寿兼寄勸诸子102
- ◎ 《蝉鸣小草》叙、记五篇 104
- ◎ 知州涂跃龙:重修名将祠记107
- ◎ 知州王赐均:亦乐园记108
- ◎ 翟翔状文 109
- ◎ 牛树梅:赵吴山遗稿叙 113
- ◎ 皇清诰封五品宜人赵母周太君传114
- ◎ 赐进士出身,诰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加一级
吴山府君行三行述115

- ◎ 王连珍:刘小航先生举乡饮大宾公跋117
- ◎ 王连珍:代溥亭户首重修德星世聚坊劝捐序118
- ◎ 王连珍:李贞女传119
- ◎ 参将郑连拔:修桥种树碑记119
- ◎ 刘思恭:我室主人传120
- ◎ 柳逢源:赠马太夫人节孝联121
-
- ◎ 寺坪诗碣122
- ◎ 吴玠三首122
- ◎ 曹璠一首123
- ◎ 柳翘才一首123
- ◎ 慕天颜二首124
- ◎ 吴镇一首124
- ◎ 傅显三首125
- ◎ 江璿一首125
- ◎ 王俸一首126
- ◎ 王汝蕃一首126
- ◎ 柳炯二首127
- ◎ 赵贡玉二十九首127
- ◎ 孔广运二首134
- ◎ 张楷一首135
- ◎ 牛树梅三首135
- ◎ 任其昌一首136
- ◎ 柳逢源一首136
- ◎ 王至甸十六首137
- ◎ 周应泮二首140
- ◎ 张文选二首140

◎ 王烜十三首	141
◎ 王海帆五首	143
◎ 无名氏一首	146
◎ 受庆龙十二首	147
<hr/>	
◎ 刘曰萃联	150
◎ 刘伯鹗条幅	151
◎ 廩生王源浩策论试卷	152
◎ 卢世塋致党志振函	153
◎ 张文源墨迹	154
◎ 刘祖禹墨迹	155
◎ 受庆龙致吴濯之信	156
◎ 受庆龙《刘氏家谱跋》	157
◎ 刘思恭小楷文抄	158
◎ 刘思恭钢笔册页两帧	159
◎ 刘思恭遗印	161
◎ 雒粹贞女士手迹	162
◎ 戴履中榜书	163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landscape painting. The scene depicts a vast mountain range with various peaks and ridges, some covered in dense pine trees. In the foreground, a calm body of water reflects the mountains and the sky.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tmospheric, with a focus on natural elements and a sense of depth and tranquility.

星
汉
灿
烂

静宁文化概说

文化是什么？它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、地理、风土人情、传统习俗、生活方式、文学艺术、行为规范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等，也就是说，“文化”的概念中既有物质的，也有非物质的内容。当然，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原始形态的文化也就伴随而至。本文所要探讨的，不是上述原生态的文化，而是形态相对稳定，且产生一定影响的静宁本土文化，为它的出现和历代嬗变，勾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，是为“概说”。

一、以抵御外侮为背景的“武文化”——宋金文化

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，新石器时代早期，静宁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。静宁周时属雍州之域，秦代为陇西郡所辖。汉初置阿阳、成纪县。唐初县城一带为南使城牧地，后被吐蕃占领，为多民族杂处之地，直至北宋置军为止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，静宁的土地上曾演出过怎样威武的历史话剧，有过怎样璀璨的文化景观，求诸史籍，一片空白。从唐初贞观时在这里设监牧使管辖牧地的史实来看，两宋之前，静宁文化的主流只能是游牧文化或半农半牧文化。这种状态延续到11世纪前期，情况才为之大变。

由于静宁战略位置的重要性，朝廷采纳了重臣曹玮、韩琦的建议，先后建立了德顺军、陇干县，置军移民，屯田垦殖，静宁开始崛起，成为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，随着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流入，文化面貌也随之一新。那么，两宋时期的文化（按地域命名习惯，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之为“德顺文化”）主流又是什么呢？德顺文化最为耀眼之处，是它的武备色彩，换句话说，德顺文化是一种以军事为主流形态的“武文化”。根据有三：

首先，在这一历史文化时期，静宁涌现了大批家族式的优秀将领，其数量之多，勋业之巨，在两宋乃至整个封建时期都属罕见：1. 吴玠家族。史有明载，吴玠自曾

祖吴谦、祖父吴遂，世居德顺陇干县（静宁），玠父吴宸(yǐ)，为水洛城寨卒（乡兵），升至指挥使。吴遂死后，吴宸借职务之便，就近在水洛城买下一片莹地葬埋了父亲。吴宸死后，家人也把他埋在这块吴氏莹地里。“庐墓三年”期间，吴家子弟渐渐和当地村民相熟，于是全家迁徙水洛城定居。吴玠十六岁不到，就以良家子身份从军，英勇善战，功勋累累。在南宋人确定的“中兴十三处战功”中，就有吴氏兄弟合力取得的和尚原、仙人关之战的重大胜利。吴玠歿后，吴玠又指挥取得了剡家湾、夺取德顺、保卫德顺的辉煌战绩。吴玠生子五人，拱、扶、扈(hū)、扩、揔(zǒng)。长子吴拱于其父在世时已握有兵权，曾指挥取得了“中兴十三处战功”之一的茨湖（今湖南沅江东南）大捷。除吴扩、吴揔年纪尚幼外，吴扶、吴扈都曾参与了战事。吴氏“手”字辈中，最为出类拔萃者当属吴玠次子吴挺。吴挺幼时即有军事天赋，德顺攻夺战中，担任主力先锋。在其后激烈的德顺保卫战中，遵父命筑堡东山以拒敌，为吴玠的得力助手。从吴宸到吴挺，吴氏一门三世从军，七人参战（实际上可能不止七人），形成了一支威震敌军的“吴家军”，雄功伟业，罕有其匹。

2.刘锜家族：刘锜之父刘仲武，秦州成纪人，刘锜是他的第九个儿子，出生在德顺军。仲武九子镇、锐、鏖、鋈、锡、鏜、钢、钊、锜中，以刘锡、刘锜最为知著。刘仲武于北宋末年，收复河湟有功，领泸川军节度使。锜未成年时就跟从父亲征讨西夏，战屡胜。公元1140年的顺昌之战，刘锜以少数兵力，大破金军铁浮图、拐子马，强敌闻风丧胆，顺昌大捷也被荣列“中兴十三处战功”之一。后金主完颜亮又大举南侵，身患重病的刘锜把长江防守的重任交给侄子刘汜(fàn)和部将李横，不久呕血数升而死。刘锜长子刘頌，当年随父在淮东抗金中阵亡；次子刘晞亦任武职，为金吾卫将军。无独有偶，刘氏也是父子上阵，三代从戎，无愧“将门”美誉。

3.郭浩家族：郭浩父亲郭成，德顺中安堡人。宋夏对峙中，领军深入敌后，捣其巢穴，名震西鄙。郭浩以父荫入官，先抗西夏，后御金人，久历阵战。入南宋后，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富平、和尚原、杀金坪等著名战役，为川陕防线的重要柱石。另一宁死不屈，为叛徒所害的名将郭洙，也是德顺中安堡人。《宋史》虽未点明他与郭成、郭浩的关系，但从他的籍贯和取名习惯来看，极有可能是郭浩的亲、堂兄弟。此外，还有曲珍诸“父族党”等等。据作者粗略统计，上述见诸史籍的将领有十六人，逝世后，有二人被追封为王，同时获谥；三人得到赠谥；一人赠少师，一人赠刺史；其他金帛恩荫奖励不等。如此厚封厚

赠集中于同一地方的将领身上，史无前例，赢得了人们的无限景仰和崇高评价。明代初年，里人就于东郊创建三忠祠，在文庙立乡贤祠，岁时祭奠英灵。明际才子赵浚谷赞道：“宋自……五路师败于富平，关陕沦为左衽，而德顺诸将，独血战向南，以张华夏，立人纪焉。伟哉，忠乎！”清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陕甘总督左宗棠路经静宁，亲至三忠祠敬献牲醴，恭读祭文，勒石立碑，书写“威宣戎索”擘窠大字，以旌先贤。刘吴史迹，也为海内外研究宋史的学者专家所注重，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。

其次，通过长达百多年抗夏抗金战争实践，德顺健儿们摸索出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战术，写出了一些具有科学价值的军事理论著作，他们于行军用兵之际，注重兵农结合、屯田自养，体现了“以民为本”的先进战略观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值得人们深思：宋夏对峙期间，宋军几乎是屡战屡败，接连遭受了三川口、好水川和定川之役三次重创，而在其后的对金作战中，却出现了捷胜连连的局面。个中因素当然非止一端，但参战人员不同乃是决定胜负的根本原因。以好水川之战为例，指挥官大都来自中原地区，曾担任过御前押班、供奉之类官职的皇帝亲信，而士兵是临时募集起来的禁军，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。这些指挥官经历战阵不多，却又倚仗皇帝的宠信，不把上司放在眼里，这就发生了主将任福违反韩琦节制，趋利轻进，加之士兵未能适应山地作战环境，从而导致一败涂地的结果。我们从西夏军师张元讥刺宋军的打油诗“满川龙凤辇，犹自说兵机”，就可以想见宋军将帅讲究排场，外强中干的情景。与此相反，宋室南迁以来，西线抗金的主力，大多是以良家子从军，从士兵起身，久经历练，作风务实且对战地特点十分熟悉的秦陇将士，故能发挥优势，每战必胜。针对金人的骑兵优势和坚韧耐战的特点，他们琢磨出了许多扬我之长、克敌之短的阵法战法：1. 吴玠首创的“驻队矢”战法。其特点是每次作战前，挑选一批劲弓强弩和优秀射手，名曰“驻队矢”。作战时，诸将轮流举射，箭如雨倾，极具杀伤力，使敌未及招架，即遭覆灭命运。该战法在和尚原、杀金坪战斗中都曾发挥了威力。2. 吴玠摹仿古代车战特点，创立“叠阵法”。每次作战时，以长枪兵为兵阵的最前排，第二排是射程最远的强弓强弩，然后才是神箭手。与敌人交战时，百步之内由神射手先射，七十步之内由所有的弓箭手一起射。排列阵列时，为了阻挡敌人骑兵，阵前设置拒马、铁钩，两翼的骑兵担任掩护。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的剡家湾大捷，显示了“叠阵”战法之神效。3. 军队序列建制上，吸取前宋禁军将帅分离

的积弊,大刀阔斧改组军队,强化训练,提高战斗力。如刘锜抓住皇帝信任、“提举宿卫亲军”的机会,把互相火并的解潜、王彦两支军队加以改编,通为六军,每军千人,经日夜操练,战斗力迅速提升,三四年后,遂成为顺昌大捷的中坚主力。吴挺任兴州都统期间,将“漫不相属”的武兴诸部编为各有名号的十军,“营部于是始井然”,成为进犯之敌的克星。与此同时,德顺诸将平时十分注意总结阵战经验,研究作战规律。“玠善读史,凡往事可师者,录置座右,积久,墙牖(yǒu)皆格言也。用兵本孙、吴,务远略,不求小近利,故能保必胜。”吴璘则更超出乃兄之上,把零散的心得体会条理化,上升为理论著作。璘“尝著兵法二篇”,详尽分析了交战双方之优劣,面对“金人有四长,我有四短”的现实,吴璘以“当反我之短,制彼之长”为主导思想,制定了以分队制其骑兵;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;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;用以远克近制其弓矢的战术原则。布阵之法,则以步军为阵心两翼,以马军为左右两肋,“至帖拨增损”,则临机而定。其思想核心,贯穿了古代军事家孙臆“一败二胜”的“三驷”之法,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和实用性,为其他将领所采用。吴氏昆仲自小参战,未暇接受正规教育,大概只是“粗识字”的文化水平,二人平日能留心战法研究,并整理成籍,其精神怎不令人肃然起敬?再有,德顺诸将出身农家,深谙民生疾苦,故能在用兵的同时,以农为本,造福生民,体现了“战争之胜负系乎民众”的“大”战略思想。宋初对夏作战时,除了种世衡、刘沪等少数将领曾有过筑城立寨,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的举措外,大多数人缺乏长远战略眼光,唯以“剿灭、荡平”为务。而德顺诸将的战争观明显高出前期之上:一曰重视农业,屯田稼穡,兴修水利,泽被生民。二吴兄弟驻守汉中期间,派军将“修复褒城古堰,溉田数千顷,民甚便之”;吴玠更是终其半生,身体力行,在“与敌对垒且十年”的时间里,“屡汰冗员,节浮费,益治屯田,岁收至十万斛”。刘锜坐镇荆南期间,带领部下堵塞了“春秋涨溢”,为患多年的黄潭堤坝,“斥膏腴田数千亩,流民自占者数千户”,大得民心。郭浩初知金州时,经历年战乱,“金州残敝特甚,户口无几”,郭浩“招辑流亡,开营田,以其规制,颁示诸路。他军以匱急仰给朝廷,浩独献赢钱十万缗以助户部”。吴拱在利州路安抚使任期,重视水利建设,“尽修六堰,浚大小渠六十五里,凡溉南郑、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”,获得朝廷明令嘉奖。二曰利民富民,赈灾恤贫,搞活经济,加强军备。得民心者得天下,当年吴玠保守和尚原,凤翔民“夜输刍粟助之”,“金人怒,伏兵渭河

邀杀之，且令保伍连坐，”但“民冒禁如故”。吴挺继其乃伯乃父一贯作风，驻军成州、西和期间，赈济水患灾民，复增筑长堤，彻底根除了水患。面对当地连年歉收的实际，吴挺号召军士口中节食，命令拿出一部分军储填补赈饷之不足，“全活殆数十万”。在冷兵器时代，战马的优劣，直接关乎战争的胜败，自从有一个名叫张松的主管樵牧之后，禁止了边境茶马互市，军中买不到良种羌马，骑兵战斗力明显下降。吴挺上书当朝，陈说利害，重开马匹自由交易市场，马源充足，边民获利，军民双赢。同时，吴挺利用当时边境相对缓和机会，密修战堡，更新军械，充实武库，以备不虞。皇帝向他征询备边急务，吴挺建言“增储之策，由是粮糗不乏”。吴挺有经济头脑，战略眼光深远，不仅见重于乃父，也得到皇帝青睐，宋孝宗称他“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”。

第三，势如雨后春笋的弓箭社组织和团练习武风尚。随着辽、西夏、金兵的频繁入侵骚扰，河东陕西沿边地带迅速兴起了军事性会社的组织——弓箭社。弓箭社大约出现在宋景德年间，“自澶渊讲和以来，百姓自相团结，为弓箭社。不论家业高下，户出一人。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，为社头、社副、录事，谓之头目。带弓而锄，佩剑而樵，出入山坂，饮食长技与北虏同。私立赏罚，严于官府，分番巡逻，铺屋相望”，“弓箭社兵与寇为邻，以战射自卫，犹号精锐”（《宋史·兵志四》）。弓箭社的出现，一方面，民无转饷之劳，士免征调之苦，节省军费开支。另一方面，弓箭社成员人自为兵，家自为战，使乡村体制趋于军事化，成为保障边境的无形长城，积极意义自不待言，得到主政者欧阳修、范仲淹、韩琦等人的一致赞同。景德二年（1005），镇戎军主帅曹玮向朝廷建言，“有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，请给以闲田，蠲(juān)其徭赋，有警，可参正兵为前锋”“据兵有功劳者，亦补军都指挥使”。该建议得到皇帝的支持，“诏人给田二顷，出甲士一人”，使弓箭社组织名正言顺地登上政治舞台。令乡人眼球为之一亮的是，《宋史·兵志》特别提到了“静宁”的弓箭手：“德顺军静边寨（今靳寺一带）壕外弓箭手尤为劲勇，夏人利其地，数来争战，朝廷为筑堡戍守……”通过这简单的记载，我们可以想见，近千年前的静宁大地上，神手健儿们骑射角斗，习武演练风俗场面；可以听到德顺子弟们万弩齐发，浴血奋战的呐喊。弓箭社的意义除了上述寓兵于农，拓土捍边的现实意义外，更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，这就是在弓箭社这一广泛的军事化社会基础上，在崇武习艺的社会风潮的影响下，

在自发组织起来以抵御外侮的严酷环境中,静宁大地上才涌现了灿若星河的优秀将领。从这一点说,战火所带来的,不仅是苦难、眼泪和不幸,也赋予了德顺子弟钢铁般的肩膀,为他们施展身手,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机会。

二、以科举应试为内核的“文文化”——明清文化

和全国其他地方类似,由于金元统治时期较短,政局不稳,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时期。洪武开基以后,人民得以休养生息,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,为文化的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。特别是经过清代的康乾盛世,静宁各项文化事业得以长足发展,显示了“州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地位,相对于周边县区,具有明显优势。其特点,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表现的“文文化”,其中毫无例外地包括了物质的(如建筑、饮食等)和非物质的(如科举、艺术等)两种形态的文化。大致说来,有如下诸特征:

其一,各项建置趋于完备,确立了与“州”行政级别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,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度提升。静宁自宋元祐八年(1093)迁军置县,金元为州。经长期战乱兵燹,州城残破不堪。明初首任州守欧阳信重开草昧,着手进行整修。后经盖瓯(huǎn)、靳善、祝祥等十一位州牧的踵修增筑,至乾隆年间,有内外两重城墙。内城有迎春、向离、钱晖三座城门,城周有护城河环绕;外城包容东、西、南关以及新城。城角四座戍楼相望,女墙设有瞭望射孔,有较强的防御作用。坚城深壕在静宁遭受的历次动乱,如土达满四叛乱、套寇入侵、李闯部的两次攻城以至清初叛将武、高的围城,同治及民国的匪乱中,发挥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。城内街道以三横四纵为主要格局,沿东关经中街至南关为主要商贸区,牲畜、盐布、粮油交易区相对集中,每日一集,有铁木、银饰等小型作坊,商贸活跃。新后街为居民区,北街为少数民族居住区,西兰公路未开通前,西关和衙门巷(今人民巷)是客店集中处,西关有供大商队停歇的骆驼场,衙门巷多为各乡人方便上县打官司而开设的小客栈,有“驻县办事处”的性质。街道有牌坊巍然耸立,最盛时有二十六座,20世纪50年代末只存四座。街头街尾有楼,楼下设门,白天洞开以通行,入夜城门楼门紧闭,可防他盗出入与非常事件。筑城之初,为节约劳力,采取就近取土,形成了县城内的“八大坑”。恰恰是这个缺陷,却给城市排水带来了方便,大坑内遍植树木,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,一到雨季便成为蓄涝池,使县城从未遭受过水淹之

灾。街道两旁绿杨垂荫,渠水潺潺,城市功能基本完善,“绿色”“环保”程度较高。明清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及其他设施的健全,与金元相较,悬殊甚大。明代除州衙,尚有察院、按察司、布政司诸名目;清代较简,但位于县城中心的州署,经多次增补,规模宏大,气象森严,远非小县衙门可比。此外,东郊(今三中附近)有演武厅(俗称大校场),供习武演练,驻防州城千总、马步兵皆有配备;城西北隅有仓贮库,库容可观,乾隆时藏粮三万余石之多。城东南角为文庙儒学,制度规模远较相邻州县之上。州署之东有书院,环境优美,是研讨讲学的最佳去处。城内寺院道观,各具特色。明清时还出现了正式的慈善机构,有专门掩殓无名尸骸的漏泽园,有收养孤贫的养济院,清代王烜在水洛、高家堡设立了两处义学,并捐置学田,简选贫苦子弟免费学习。农业方面,由于明清两代不断改革税制,先有明中叶“一条鞭法”代替沿袭多年的两税制,继有康熙“盛世孳生册”乃至雍正“以地载丁”的颁行,较大程度减轻了农民负担,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。而明初开始实行的兵农合一的屯卫制度,组织严密,耕作技术先进,其示范作用无疑会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所推动。昔日为唐牧马之地的南使城(今靳寺一带),已成田畴连片的平凉卫地,呈现着一派“大农业”的气象。以葫芦河为代表的河谷川地,转型为种植、养殖为主的完全农耕经济。这使“康熙志”的作者们也不由叹道:“传闻静宁三十年前,菜蔬半需他产,后来郡人来治圃事,习者始多,今乃繁殖。南乡种稻亦不数年……”号称农业命脉的水利此时也有较大发展。经历代州守努力,水利事业从无到有,先后创建了玉带堤、兴陇渠等水利设施,以时蓄泄,灌田数百顷,威戎、甘磴、仁当川等地则更为发达。据乾隆时统计,全州有水磨四百八十座,这在“苦甲天下”的干旱地区,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。交通方面,静宁地处“官道”,泾阳驿为较大驿站,下设递运所,其中驿马民夫配备齐全。沿途铺递相连,十分通畅。境内苦水河、甜水河建有桥梁,过往便利。据统计,乾隆时静宁十四里民户为一万五千,人口十四万三千,州城户一千六百,人口一万三千,二者合计全州人口为十五万六千(其时庄浪早已直隶平凉府,人口不在计算内),俨然泱泱大州,为翻越六盘,西赴省城途中少有其匹的中间站。

其二,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,文化面貌一新。文庙儒学,是一个地方文风兴衰的标志,具有领风气之先的作用。静宁建文庙学舍,始于金代威戎令任天宠。自明洪武六年(1373),知州欧阳信于州城创建孔庙儒学以来,屡有改迁。最大的两次

一是嘉靖李必敷、李时中迁学庙于城东南；二是康熙时董守义的全面彻底整修，“規制弘敞，甲于西陲”。文庙门前有大照壁为屏障，东西各有牌坊拱卫，上书：“德配天地，道冠古今”和“删述六经，垂宪万世”。进入大门棂星门，越泮池，穿戟门，便是占地约280平方米，祭祀“大成至圣先师”的大成殿。次于大殿等级的其他建筑还有启圣祠、乡贤名宦祠、忠孝节义祠等。文庙以西为儒学，以明伦堂为中轴线，左右是“兴诗”“立礼”斋，后为“敬一亭”，以及学正、训导宅等。两组建筑一大一小，均为典型的明代风格，院内古柏森森，以人高山仰止的肃穆感觉。文庙除祭祀孔子而外，配祭者有亚圣孟子、孔门七十二弟子以及历代先儒百人左右。庙藏祭器明代有壶、尊、豆、笱(biān)等二十六种之多，后有佚失，亦有添补。每年二、八月上丁日举行大祭，先师位祭品有太羹、鹿醢(hǎi)、芹菹(zū)、榛栗等二十九种之多，所奏乐曲有《咸和》《宁和》《安和》《景和》凡七章。其他配享者不等。今天看来，文庙规模之巨，祭孔典礼之盛，实际上折射的是地方上尊师重教风气浓淡程度，在这方面，周边区县无法望其项背。文庙以西的儒学，内设学正和训导，收取生员、增生各三十名。儒学而外，尚有书院、义学。静宁书院之滥觞，起自明成化时的祝祥，至清康熙朝，州牧黄廷钰在明察院废址上始构陇干书院，后任州守不断增筑，并捐款购置学田，以图久远。此外，黄牧还在州东偏，后任王烜在水洛、高家堡设立义学，“以收教家贫无力求学者”。新考取的秀才，要举行“新生入庠礼”，生员披红簪花，鼓乐导引，知州亲送至学；“新科第进士举人初至”，行“迎宾礼”，“知州设宴于东郊外，躬迎进城，亲造其家往贺”。正是基于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，静宁科举人才自明而清不断增加。明代进士两名：姚爵和王瓚；清代仅据笔者所知有五名，他们是慕天颜和慕琛(父子进士)、叶桂、王源瀚和王曜南(父子进士)。其余举人、贡生增长比例更大。在传统文化这一块，较为明显的文化高潮有两次，一是明成化时期，由祝祥积极倡导，以及他个人的影响，始有诗教之浸润，通过其时留下来的一批《息肩亭诗》，我们可以依稀想见当时风流太守与僚属、门生少长咸集，相互酬酢(cù)的盛况。二是因黄公倡导，康乾嘉年间出现的第二次文学繁荣。当时，文采风流辈出，赵为卿、马一熊、江自岷、江瑞芝等以诗画诗文名于当世；刘曰萃、刘伯鹞(yǎo)、叶桂、叶树桢踵之于后，他们大多有专集刊行。但因种种原因，尤其是“文革”的毁坏，留世极少。两部《静宁州志·艺文志》收录的仅为乾嘉以前的诗文，使我们无法窥视静宁地

方文学的全貌。而于此时出现的众多文化世家,却为静宁文化史册增添了不少光彩。其佼佼者(如王源瀚家族)历经明清、民国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达四个多世纪。他们是:

1.王源瀚世族。王氏世族的崛起,起自明嘉靖时的王延龄。王延龄,号苍崖,遵教里(今仁大一带)人。曾任山西介休县丞、知县。兴学息盗,政声丕著。有《苍崖集》五卷刻行于世。子王守。孙王大才,初任四川大足县令,后升云南曲靖同知。王大才雅意林泉,毅然回籍,筑室家园,读书不辍。时兼染翰,笔法一尊古人,为文主于庄丽。长子王珙,自号山林野客,贡生。立志读书,至老不辍,著《素位录》一卷。次子王琪,字襟崆。少颖达,好古博学,家世藏书数万卷,一一评鹭丹黄,撷其精英,至老不少倦。为文有体,诗亦入格,至今言文学者,尤必曰王某云。所著有《袜线集》十卷,藏于家。三子王瓚,字襟白,崇祯辛未(1631)进士,授湖广提刑按察司分巡武昌监军道僉事。崇祯末抵抗张献忠流寇,收复武汉。入清后归里,屡召不出,著有《芝兰斋诗草》若干卷,刊行。王源瀚即为王瓚嫡派后裔。源瀚,字奋涛,号海门。光绪十二年(1886)进士,官江西南康知县,晚岁历主阿阳、柳湖、五原各书院讲席。著《六戊诗草》六卷,陇上学者慕寿祺称其诗:“浅显易知,殆香山之流亚。”其子王曜南,字有轩,号午天。受父严教,从小博览群书,光绪二十一年(1895)进士,“父进士,子进士,父子进士”是晚清甘肃科举史上的佳话。曜南赴京会试期间,积极参与“公车上书”,为甘肃在请愿书上签名的61位举人之一。清末民初,在家耕读教子,以度晚年。著《学古轩诗草》,人称“学古有获,平淡增趣”。王曜南子尔全,字安卿,人称“四少”,民初毕业于省优级师范,1941年,创办了静宁中学。诗文书法俱各擅长,因专心教育,著述较少。王氏一门诗礼传家,屡有著述,经历三代而不衰,陇右罕有,实属难得。

2.刘曰萃世族:刘氏发达,始自康熙、雍正朝的贡生刘元。刘元事迹不详,但他的继室江瑞芝却是一位奇女才女。刘元、江瑞芝之子刘曰萃,字正占,号三梅,幼年受其母江瑞芝严教,“读书甚博,工诗文,善书画”。教授生徒,门多伟士。所与往来如李杏村、化鼎吉、马擢三、穆范庵,皆一时之俊,而刘曰萃年最少,品学推为第一,静宁诗文唱和之盛,无过其时,有《三梅斋诗稿》行世。刘曰萃子刘伯鹗,号小航,道光辛巳(1821)恩科举人,任泾川学正,敦煌县训导,庆阳府教授,名重一时。刘氏后

人刘仿穆，号春甫，曾任通渭训导，兰山书院山长，工书法。刘继穆，号石樵，贡生，候选儒学训导。再后刘祖禹，字锡卿，号梅亭，前清增补邑庠生员，善书。刘思恭为其子。刘思恭一名寺公，字子安，又字紫庵，行四，生于民国六年(1917)三月，世代书香门第的熏染，加上禀赋不凡，少年时即可吟诗作文，其文理皆有可观者。后考入兰州后期师范，为诸生翘楚，深得陇上学者慕少堂、李行之诸大家的垂青。毕业后，先就教于平凉女师、力行公学；后受静宁王尔全之邀，从教静宁中学。诗作多佚，少量收入《长夜集》中。

3.江锭世族：江氏祖上江深，明朝成化年间任四川夔(kuí)州府照磨。子江岳，字永镇，嘉靖十二年(1533)选贡，任四川广安州判，清慎慈祥，征税不扰，后致仕。江岳子江玉泉，字汝达，万历六年(1578)选贡，任四川灌县主簿。江渤，字汉海，为江玉泉次子。性鲠介，慎名节，恬退自矢，不喜纷华。除知山西芮城县，解组之日，囊橐萧然。“渤穷经有得，归里杜门，手不释卷，所著有《春秋题旨》若干卷，藏于家……自广安、灌县以迄芮城，父、子、孙三世拔萃，清德相承，亦可风矣。”江渤元孙江锭，字彝珍，癸巳(1713)万寿科举经元，拣选知县户部学习，诗文清丽。曾参与康熙《静宁州志》的编修。江锭长子江自岷，字汇百，雍正丙午(1726)科举人，候补知县，乾隆十年(1745)，代理长芦富国场大使。其女江瑞芝，系明清时期静宁唯一之女诗人。《甘肃通志·才女传》三卷十八：“江瑞芝，字天香，静宁江自岷女，副贡刘曰萃之母。幼从父学，性颇颖慧，及父官天津，女红之暇，博览群书，尤耽吟咏。”晚年与其夫相与唱和，赌茗为胜，人皆以易安夫妻目之。诗作“至性缠绵，韵成天籁”。著有《蝉鸣小草》60篇行世。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封建意识浓厚的环境里，江家出了这样一位才女，凤毛麟角，堪称静宁人的骄傲。

4.慕天颜世族：慕天颜祖上原姓慕容。其祖父慕容三让，字敦礼，静宁阜民坊人，明崇祯十六年(1643)入贡，任河南灵宝知县，有惠政，值流寇乱，练义勇以靖地方。父慕忠始去容为慕。慕天颜从叔慕节、慕谦，分别为康熙朝贡生、廪生。慕天颜，字拱极，一字鹤鸣，顺治乙未(1655)进士，清朝著名的理财家、实干家。平生以文章经济为己任，兴利革弊，筹集军备，疏通漕运，出使台湾，颇多建树。官至督抚大员，是静宁明清以来仕宦之途上的佼佼者。从政每有心得要领，辄为笔录记载，有《抚吴封事》八卷，《楚黔封事》二卷，《督漕封事》一卷，《集瑞陈言》一卷刊行。慕